

文化进化论：回顾与前瞻

王 铭 铭

“进化”(evolution)一词原指事物由一种状态逐渐地、有秩序地转变为另一种状态。它长期以来在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中被广泛采用；作为解释人类文化现象的概念，“进化”一词在文化人类学中也有广泛的影响。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用进化的观点来解释社会文化的演变、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学的文化进化论曾经给予充分的肯定，他们所著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它的瓦解原因、过程和结果〉一书摘要》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书体现了他们对社会文化进化观的革命性和科学性的极大关注。

19世纪以来，文化进化论一直处于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先后产生了不同的进化论学说，到20世纪50年代逐步形成的新与旧对照的现象。本文拟简单回顾文化进化论的发展史并对我国文化进化论研究的前景作一个设想，不妥之处，望批评指正。

一、回顾：文化进化论发展的三个阶段

回顾19世纪以来文化进化论的发展史，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它有如下三个发展阶段：

(一)古典文化进化论阶段(1860—1890年)

这个阶段是文化人类学的确立阶段，也是文化进化论的早期发展阶段。这个时期文化进化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社会学家斯宾塞(H. Spencer)、人类学家泰勒(E. B. Tylor)和摩尔根(L. Morgan)。他们的文化进化观有如下几个特点：

(1)他们所探索的对象是全人类文化的总体发展，而不是单独的某一个文化的变迁。例如，斯宾塞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是社会进化过程的一部分，任何的发展过程都包括两个方面——集中与分化。他高度抽象概括了人类社会文化进化的现象。又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泰勒的《原始文化》等书都是通过民族志和考古学资料来探讨全人类文化的总体历程，很少论及具体的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的发展；

(2)19世纪的进化论是单线的进化论，即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是沿着单一的线路、由低级向高级直线前进的。例如，摩尔根曾明确指出：“人类的经验所遵循的途径基本上是相同的……。”^①泰勒也说过：“只要把野蛮的各部落同文明的各族加以比较，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野蛮种族怎样一步步转变为高级种族，也会清楚地认识到二者的历史联系。”^②

(3)19世纪的进化论都强调人类心理能力的一致性及其对文化进化的决定性作用。摩尔根说：“由于人类所有种族的大脑无不相同，因而心理法则的作用也是一致的。”^③

(4)在研究方法上，古典进化论者十分重视采用“文化残余”和“文化类比”的方法，把不同的文化现象加以“逻辑的”类比，把某些在他们看来较为“落后”的文化视为人类早期文化的残余，并找出文化残余所应代表的不同时代或阶段，然后，通过分析，将不同的文化排成序列，代表全人类文化的演进过程。

(二)文化进化论批判阶段(1890—1930年)

古典进化论产生和发展的时期，正是“文化进步论”与“文化退化论”互相交锋的时期。当时流行的“文化退化论”认为：人类文化的早期是一种“半文明”的状态，后来，人类朝两个方向发展：朝前进方向发展的变成“文明人”，朝后进方向发展的变成“野蛮人”。文化进化论者自始至终是站在批评退化论的立场上来阐述他们的观点的，他们是进步的，但在理论的阐述上过于偏激。加之当时的文化人类学家受时代的局限，受思想方法及研究手段的局限，因此所得出的结论不够严密并且有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倾向。也正是因为如此，古典文化进化论到19世纪末便开始受到多方面的抨击。

传播学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早期流行于德、英国的一种理论，它用“传播（diffusion）”这个原指“扩散”或“漫流”的词来解释文化现象，认为世界之所以存在类似的文化特质，乃是由文化的扩散而致。这个学派把人类文化史归结为文化移动、接触、冲突、借用，反对古典进化论的“心理一致”、“独立发明”等基本观点。

几乎与此同时，美国一些人类学家也在批评其他学派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历史学派”或“批评学派”。这个学派在理论上和实际研究工作上都与古典进化论相对抗。它认为不能从全人类的整体研究文化，而应当首先具体研究各个民族的各种不同文化。这个学派主张文化独立论与文化相对论，与古典进化论的文化评价观相对立，主张文化无“进步”与“落后”之分，每种文化的存在都有其特殊的依据。

在法国，古典进化论也遭到了严厉的批评。法国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列维-布留尔（Levy-Bruhl）极力反对人类心理智慧一致性的学说，他认为“原始人”的思维是一种注重事物神秘属性的，与“我们”的思维很不一样的思维方式。

英国的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斯基 (B. Malinowski) 用工具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文化，反对泰勒等古典进化论者的“文化残存说。”他主张文化整体论，认为古典进化论者把文化的元素任意分开比较是不附合科学原理的。

(三) 文化进化论复兴阶段 (1950年——)

古典进化论所受的批评是极为严厉的，而且各方面的批评都有一定的根据。但文化进化论的现象却是客观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古典进化论的某些缺陷并不能说明进化论的无效。因此，作为科学发展的必然现象，进化的、发展的观点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又重新受到一些人类学家的重视。例如，美国人类学家哥登威塞 (A. Goldenweiser) 曾经明确指出：进化历程的普遍性、整齐性与渐进性都可以被否定，但“进化”实际上是存在的。^④ 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 (G. Childe) 也开始了文化进化的研究，他在原则上坚持进化论的发展观，此外，他把进化论从“蒙昧”、“野蛮”、“文明”这一类的心理描述中解放出来，树立了文化发展的唯物史观。

更重要的是，50年代前后美国一些人类学家开始了复兴文化进化论的一系列工作。1957年到1958年，美国华盛顿人类学协会为纪念达尔文的名著《物种起源》一书出版一百周年举行了一次学术讨论会，重新确立了进化论在人类学中的地位。在此前后，著名人类学家怀特 (L. White)、斯图尔德 (J. Steward) 等人倡导“新进化论”坚持文化进化论的文化演化观，使文化进化论得到了很大发展。这个时期的新进化论与古典进化论已有许多不同：

(1) 新进化论把更多的自然科学概念和方法引入了人类学领域，使自身的理论和方法都得到了更新。例如，怀特创立了“热力学第二定律”，主张能量是测量人类文化进步水平的准绳之

一。⑤斯图尔德创用“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把生态学理论方法引进了文化人类学领域；

(2)新进化论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动力和线路问题，提出了与19世纪进化论不同的看法。关于文化发展的首要动因问题，怀特特别强调技术、经济因素对文化进化的决定性作用；斯图尔德注重文化“核心”制定与生态环境的互相作用的重要性。关于文化进化的线路问题，怀特主张“普遍进化”，斯图尔德则主张多线进化，认为具体的文化发展只有不同的线路，而没有一般的规律。更值得注意的是，新进化论者基本上已经克服了古典进化论的“精神决定论”的缺陷，更多地考察技术、经济、生态等因素，这对于我们客观地阐释文化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

(3)新进化论者在研究方法上努力摒弃传统的纯逻辑思维、纯实证的做法，大量吸收不同学派的有益成分，使文化进化论的方法论大大地得到了发展。

二、前瞻：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进化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人类学工作者展开了对原始社会分期的讨论，史学工作者展开了对历史哲学问题的讨论。这一系列工作对于文化进化论的研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我国学术界在全面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发展观及批判地吸收当代国外文化人类学的新成果方面却做得不够。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社会文化进化问题的探讨仅仅停留在评介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观，对于其他一些文化进化论学者的学说都没有好好地总结、探讨。实际上，无论是古典进化论还是新进化论，它们所探讨的对象最终都归结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规律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历史唯物主

义的基本问题。笔者以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原则的指导下，不断吸收当代文化人类学的新成果、不断创新，才能把我国文化进化论以至文化人类学推向发展。

发展地、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文化进化论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应该遵循这一思想原则。从这一点出发，笔者以为今后我国的文化进化论研究应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1)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观的同时，探讨社会文化发展的多样性问题。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它涉及自然环境、生产技术、社会政治、宗教艺术等方面的问题。对如此复杂的现象的研究，无疑需要树立历时性的准则，否则，很难使我们得到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是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螺旋式的上升发展，这个方向是肯定的；但马克思主义又承认历史发展有其具体的途径、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有不同的特点。也就是说文化进化是肯定的，而这个进化的具体过程却是多样性的。当代著名的人类学家萨林斯(M. Sahlins)和塞维斯(E. Service)主张，生物界与文化界的进化都同时朝两个方向推进。一方面，通过适应性改变造成差异：新类型从旧类型中分化出来。另一方面，进化产生进步：较高的类型从较低级的类型演变而来并超越较低级的类型。”^⑥文化发展有普遍性与特殊性，这是文化发展的辩证法。在文化进化的研究中，我们应确立时间的横轴、一般发展水平的纵轴及表示类型差异的象限组成的坐标，这样才能客观地考察文化。

(2) 马克思主义认为要全面地看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文化的发展。在人类学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先后产生了进化论、传播论、社会学派、历史学派、功能学派、心理学派、结构主义等学说。每一种学说都有各自的优点与缺陷，

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视野。马克思主义认为用“自然史”和“人类史”的方法来进行科学研究是最为重要的，但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历史”中并不纯粹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它还包括功能、结构、心理等方面的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⑦列宁也曾经谈到：“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会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⑧在他们的一系列论著中，“功能”（Function）、“结构”（structure）“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向来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文化人类学中，整体论（holism）是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它认为内容广泛的文化最终是一个整体。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观点相一致，对于全面研究文化的进化有很深刻的意义，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换言之，我们应当综合探讨文化功能、结构、特性、形貌并把这些探讨与文化进化观相结合，以达到全面了解文化的目的。

（3）从联系的观点出发，就要求我们在文化发展的研究中，要注意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历史上，文化的发展变化与不同民族文化的互相接触、影响以至融合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文化接触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当代文化人类学中，涵化理论已经系统地、完整地提出来了，它对于文化发展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谓“涵化”（acculturation）指的是不同文化发生接触之后，双方或一方所发生的文化改变，它造成了取代、综摄、增添、萎缩、起源、排拒等文化现象。过去大多数文化进化论者都认为文化是封闭系统，但这观点是错误的。现代科学已经证明：文化不仅向生态系统开放，而且互相开放。当代世界系统论认为世界的经济、文化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一个体系，各个国

家、各个民族、各种文化都是相互联系、互为功能的，文化交流对于文化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文化进化的研究不应排斥对文化传播、涵化现象的探讨。

(4)要全面探讨文化进化的动力问题。关于文化进化的动力问题，历来说法不一。古典进化论派强调独立发明的作用，传播论派强调文化的扩散的作用，功能学派强调文化因子的引入与文化的内部调适，新进化论强调技术、生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发展的内因是主要的，但外因也必不可少，它通过内因起作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进化动力论是以内因作为主线的，它强调文化制度（主要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与人本身的生产这两个方面的社会文化制度）本身的决定性作用，但向来不低估自然生态环境、文化接触等外因对于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文化进化有主要动力，但它的动力是多方面的，因而对它的研究也应当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

总之，科学的文化进化论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原则的指导下、博取众家之长、建立在丰富的人类学资料基础上的文化发展观。它采取内外因结合的、历时方法与共时方法结合的、全面的、联系的观点来探讨文化变迁与进化。

这种综合性的进化论并未得到全面的阐述，但是从文化进化论发展的现状看，它是一种必然的趋势。19世纪的文化进化论由于本身的片面性而遭到了传播论派、历史学派、功能学派的严厉批评，到了新进化论时期，文化进化论已经吸收了诸如功能主义、相对主义等学说的某些合理成份，从而显示出了巨大的包容性。但这种包容性由于学派之争而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这是令人遗憾的。从科学发展、人类认识发展及社会实践发展的要求来看，在文化人类学中牢固树立一种发展的、全面的、联系的科学文化理论是势所必需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进化论

的前景才是壮观的。

注释

①③摩尔根著，杨东莼等译：《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8页。

②E. B. Tylor: Primitive Culture, New York, 1913, 4th edition, P. 38—39.

④林惠祥：《民族学学说的新综合——新进化论》，见中山文化教育馆编《民族学研究集刊》第1辑。

⑤Leslie A. White: The Concept of Cultur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1(1951), P. 56.

⑥M. Sahlins and E. Service: Evolution and Culture,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60, P12—13.

⑦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页。

⑧《列宁全集》第2卷，第443页。